霞云岭响起的礼赞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记

光辉历程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7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

时值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西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

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8名儿童团员。

“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当年14岁的堂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

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六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七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的胜利之时。

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讷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

73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

“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做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

“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得到答案。

而今，这方红色沃土，再一次成为人们回溯信仰追求的胜地。建党95周年之际，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广泛开展，一批又一批新老党员来到霞云岭堂上村，在依山而塑的960平方米党旗见证下，举行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文/新华社记者 梁天韵

（新华社电）

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访重庆周公馆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周公馆”。抗战8年，在周恩来领导下，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常驻于此，成为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在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式院落里，珍藏着几十张老照片，真实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让历史在这里驻足，向世人讲述着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光辉历程。

叩开周公馆厚厚的大门，前院天井的墙上悬挂着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照片以及南方局组织机构图。其中一张周公馆平面图格外引人注意，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这里复杂的斗争环境。

“门内有国民党高官，门外有军统局特务，这就是周公馆复杂甚至是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郭亮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中共代表初来重庆时，由于住房紧张，只能和国民党人共租一院。8年中，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一段佳话。

周公馆大门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右行不足百米，就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为了监视曾家岩，军统特务在路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目光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上。而我党的同志，也对监视点的特务认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谁是干什么的。

“在如此危险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却从容不迫，在敌人的眼皮下纵横捭阖，有力领导了国统区的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极高的斗争艺术。”重庆红岩连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后院是南方局的核心住址。左侧一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面的摆设都是原样复原：十几平方米大小，办公桌椅、一张床、两三件旧式家具，非常简单。门口墙上悬挂着一组周恩来夫妇的照片：有周恩来在此办公的工作照，还有二人1940年在重庆纪念结婚15周年的留影。每张照片他们都面带微笑，这样的笑容感染了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内设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和外事组等重要机构。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领导他们深入开展抗日民主文化运动是南方局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之一。

后院一楼过厅右侧的文化组办公室内挂满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柳亚子、沈钧儒、叶圣陶等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的照片。其中，“雾季公演”和“香港大营救”两组照片弥足珍贵，真实记录了我党领导的这两次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文化运动。

1941年，由于蒋介石发动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得重庆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所有行动都受到国民党特务打压，人们的心头都有着沉甸甸的压抑感。能够驾驭政治气氛的周恩来选中了当时陪都重庆的话剧作为突破口，发起组织雾季公演，让文化界人士先后排演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剧目，使山城气氛终于活跃起来。这些剧目的珍贵演出照真实再现了当时情境和万人空巷一睹爱国剧目的场景。雾季公演持续4年之久，有100多部进步剧目在渝公演，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的迫害，南方局帮助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疏散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及时把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安全转移回内地，史称“香港大营救”。周公馆文化组办公室内的照片就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境。在一张被营救出的香港部分文化人合影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虽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逃亡，但这些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文化名人身上却显露出无比的坚定。

郭亮说，整个“香港大营救”期间，我党先后营救出数百位文化人士，其中包括邹韬奋、茅盾、叶以群、胡绳、盛家伦、夏衍等文化名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中国保存了重要的文化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进步人士共同革命是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周公馆里的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这其中的一段历史。

当时，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是周公馆里的常客。周恩来甚至在这里亲手做过他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招待众人。周公馆条件艰苦，开饭时，桌凳、碗筷都不够，然而所到的客人都不以为意，反而谈笑风生，相聚甚欢。

文/新华社记者 陈国洲

（新华社电）

民族脊梁

孔繁森：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六七月间的西藏阿里，高原红柳花开得绚烂。沉默的冈底斯山，远远矗立在狮泉河镇地平线上，犹如一座丰碑。

而孔繁森的名字，就深深镌刻在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成为流传在西藏干部群众心中最温暖的故事。

1979年，孔繁森告别山东聊城父老乡亲来到这里。从进藏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尔后，他三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在阿里烈士陵园，2015年进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陈锦讲解着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一生的故事，刻在纪念碑前的对联述说着人们对他的敬佩：“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

“我是因为孔书记才知道了阿里。孔书记真的特别伟大。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陈锦说。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自愿将原本一年的西部计划服务期再延长一年。“来了阿里，亲眼见到当地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让我觉得能成为一名党员很光荣。”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以此情怀，孔繁森在藏期间先后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赴藏前，他请人写下“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藏后，他又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

孔繁森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右）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

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在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藏族农牧民称孔繁森为“药箱书记”。粗通医术的孔繁森，看到藏族群众缺医少药，每次下乡都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

而阿里的发展更是凝聚着孔繁森的全部心血。短短一年多时间，走访98个乡镇，行程8万多公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他说：“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在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因为一场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人们料理他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孔繁森8.6元；二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12条建议既包括了设机场、修国道、建电站等改善阿里能源交通“瓶颈”的对策，也涵盖有财政、民生、教育等群众所关切的问题。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欣慰的是，一批批阿里干部群众在“孔繁森精神”的激励下，已将这些遗愿一一变为现实：

——进出阿里生命线的219国道油路贯通；

——昆莎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阿里单一的公路交通运输历史；

——狮泉河水电站和一批太阳能光伏电站投产，改善了阿里的能源条件；

——农牧民群众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将孔繁森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干部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扎根边疆30多年的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李玉建，曾是孔繁森生前的同事。在他看来，孔繁森精神已成为阿里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我们很自豪地说，一批一批的干部群众通过努力，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边疆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现如今，在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的狮泉河镇，繁森路和孔繁森小学这些名字，承载着人们对这位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难以磨灭的记忆。

来自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欧珠多吉，今年12岁，在孔繁森小学5年级1班就读。“孔爷爷是好人，老百姓遇到困难就找他。”欧珠多吉说。隔壁班的巴旦其美家住噶尔县左左乡，他告诉记者，从二年级开始，他就记住了孔繁森这个名字，“孔爷爷是阿里的书记，为我们建起了学校”。

这两个藏族孩子用藏汉双语郑重地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

“孔繁森在我的心里。”

文/新华社记者 林威 汤阳

（新华社电）

红旗飘飘

琼岛

海南

本报记者 何伟

“我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深厚的不可割舍的情感，能为农民脱贫致富做点事，我感到无比激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陈奎明说。

8年来，陈奎明的足迹踏遍海南岛204个乡镇、1000多个行政村。他带领500多名大学生团队，为60多万农民送去支农资金，被农民朋友称为增收致富的贴心人。

2008年，34岁的陈奎明放弃央企优厚待遇，加盟组建不久的海南农信社。此时的海南农信社存款仅97亿元，历年亏损高达54.6亿元；小额贷款不良率超过90%，濒临破产。

陈奎明在工作中发现，农民很难贷到款。究其原因，是农信社员工认为农民不讲诚信，而农民也不相信濒临破产的农信社会真心为他们服务。两方面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农村信贷工作停滞不前，亟需攻坚克难。

陈奎明一头扎进莽莽五指山，深入琼中少数民族地区，在田间地头和农村党员群众开了几十场座谈会，走访了1000多个农户。许多农民反映，贷款的手续很繁琐，贷款时间非常长，贷款的人情成本高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陈奎明认为，应当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支持农民发展生产。

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以及理事长吴伟雄的支持下，陈奎明组建了小额信贷团队，全面负责小额信贷金融支农模式的试点和推广。陈奎明主动请缨担任这个团队的首任“班长”——琼中小额信贷总部主任。

在发挥党员引领示范作用，打造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小额信贷队伍方面，陈奎明下了一番狠功夫。

他定期讲党课，给队员讲党章党史，讲支农惠农政策，引导这支年轻的队伍向党组织靠拢、向党员标准看齐。2010年，陈奎明担任琼中联社党委书记，推动成立小额信贷总部党总支，随后又陆续推动设立19个小额信贷部党支部，建成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战斗堡垒。

陈奎明定下“三大铁律”：不喝农民一口水、不抽农民一支烟、不拿农民一分钱。工作中，党员同志带头，必须佩戴党徽，亮明身份，带领其他队员“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干部。

陈奎明更是率先垂范，亲历亲为，坚持进农家屋，干农家活，交农家友，培训贷款贴息政策，亲自发放小额贷款。

2014年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横扫琼州大地。第二天，陈奎明就带着小额信贷团队，奔赴抗风救灾第一线，向受灾农户发放小额贷款5300多万元。

台风中心文昌市铺前镇中台村农户吴团拿着陈奎明现场发放的2万元无抵押贷款，感动得热泪盈眶：“台风把我家100亩瓜田全打没了，有了这2万元，我就可以补上一季，挽回损失。”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深知农民的酸甜苦辣。”陈奎明常说，农信社就是要做农民的贴心人。

打通助农增收“最后一公里”，做实普惠金融，让农民朋友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是陈奎明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坚持“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的工作思路，最终形成海南“一小通”小额信贷金融支农新模式。

他们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创新诚信保证金制度，引导农民讲诚信，降低利率，让利于民。把贷款风险“防控权”交给信贷员，信贷员3至6人联保，监督他人也接受他人监督。把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员，强化风险责任意识，引入薪酬延期支付方式，防止短期行为。把贷款“管理权”交给计算机，采集110多万农户信息，实现农户贷款有效管理。

8年来，琼中小额信贷总部累计发放5万元以下小额贷款58亿元，惠及27万户；带动海南省农信社发放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218亿元，惠及62万户，较好地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推动力量。

老区百色实现跨越发展

动车在百色市田阳县境内行驶(6月23日摄)。

广西百色是著名革命老区，1929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百色成功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如今，右江河畔的百色发生沧桑巨变，实现跨越发展。“十二五”末，百色的地区生产总值达980.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28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1022亿元，财政收入达114.5亿元。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